

列昂纳德·根德林著

克里姆林宫大墙之内

——斯大林和歌剧演员达维多娃

肃然
杨晓
余云
译校

华夏出版社

克里姆林宫大墙之内

——斯大林和歌剧演员达维多娃

列昂纳德·根德林 著

肃然 杨晓 译

余云校

华夏出版社

1988·北京

克里姆林宫大墙之内

——斯大林和歌剧演员达维多娃

列昂纳德·根德林著

肃然 杨晓 译

余云 校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河北省遵化县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375印张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0册

ISBN7—80053—485—5/K·033

定价：6.4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莫斯科大剧院著名歌剧演员达维多娃的回忆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以达维多娃与斯大林的私生活为主要线索，以苏联党政要人在克里姆林宫大墙之内和大墙之外豪华别墅中的活动为背景，展现了斯大林执政年代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斯大林是人不是神。自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死后，他是否象苏联官方所说，只过着紧张的政治斗争生活，只有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呢，还是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对爱的追求和婚恋生活的渴望？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个令人关注而不可解的谜。

这本回忆录性质的历史小说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疑团。国色天姿的达维多娃回忆了她伴随斯大林度过二十个春秋、彼此恩恩怨怨的生活，揭露了亚戈达、贝利亚之流达官显贵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卑劣灵魂，描绘了维辛斯基等人玩弄外交和政客手腕的丑恶嘴脸，谅解了基洛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对她的爱慕之情，叙述了她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苏军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之间一段撕心裂腹的感情纠葛。

与此同时，达维多娃对苏联历史上的党内斗争、肃反扩大化、残酷迫害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内幕也有所披露。为什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最近指出，斯大林是个独裁者，犯下了摧残人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呢？为什么莫斯科要为受斯大林迫害致死的人树立纪念碑呢？……我国青年、大学生、研究生、各类学校的教师、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工农兵商和干部等广大读者，

读完此书就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能从中吸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教益。

鉴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八年九月于北京

上 卷

1

我是在1945年末认识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的。我们有过多次饶有趣味而又难以忘怀的会面。

“您是个勇敢的人吗？”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次会面时她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那要看对什么而言了。”

“我有些往事需要回忆，您愿意将一位女演员的讲述记载下来吗？如果把我的故事写成小说，我会欣然同意的。这样做会更稳妥些，因为写成文献就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了。”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和斯大林 姘居了19年。那么为什么我要迈出责任如此重大而又具有极大危险的一步呢？为什么要把人们闻所未闻的斯大林的私生活告诉您呢？”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神经质地咬了一下嘴唇，继续说道，“也许您正在想，我生前需要再捞一些荣誉，不然死后也应当留下耸人听闻的坏名声。您若是这样想，那就错了。我有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荣获过多枚勋章和奖章，而且三次被授予斯大林奖金。我积蓄了一些钱财，还因‘特殊功勋’而领取个人退休金。我是第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在给 学生辅导之余，还做家庭教师。或许您会认为，我是一个曾被抛弃的、恼羞成怒的情妇，因而下决心对昔日拥有无限权力而今长眠地下的领袖进行报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很清楚，斯大林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我的，他总是急不可待地盼望

我的到来。然而，只有现在，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敢直言不讳地说，在那19年的日日月月里，我违心地取悦于他，被迫地玩弄自己的感情。”

“我是一名演员！这或许就是我在满腹狐疑的斯大林心目中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的原因吧！当然，在他的助手当中，还有一个可以同我相媲美的人，这就是最忠于他的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科列贝舍夫。

多年来，我一直被迫地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我不得不在剧院、排练场、音乐会上从事排演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斯大林热烈而疯狂的爱抚中消磨时光。

我之所以讲述这一切，是希望在我死后人们能够认识和了解另一个斯大林——剥去伪装的斯大林。”

2

我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父亲是土地测量员，母亲是人民教师。我出生后不久，全家便迁居远东，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从童年起，我就爱上了原始大森林，喜欢钓鱼、点燃篝火，爱听泛着狂涛骇浪的阿穆尔河的呼啸声。1920年，日本人企图侵占我们的城市，于是我们只好抛弃一切，逃往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合唱团里当了几年的教师。1924年，我很走运，考上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主考人之一是作曲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他在我们这些大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认为我的声乐素质很好，有培养前途。当我在歌剧学校演唱了《卡门》的独唱以后，就被调到马林歌剧院（现为基洛夫歌舞剧院）工作。我在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新教徒》中扮演风流少年乌尔班，从此开始了舞台生涯。我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有如登上了九重天。当时我才23岁，连最要好的女友也在偷偷地忌妒我。我创作上的每次成功都使她们感到痛苦。剧院让我演唱歌剧《艾达》、《卡门》和《霍万斯基叛乱》

的主要独唱部分。

当时主宰着列宁格勒歌剧舞台的是索菲亚·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她很早就得到彼得格勒的实际独裁者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的青睐。

有多少个晚上，我在空荡无人的大厅里练唱，又有多少个深夜，我倒锁上演员练唱室的门，避开大家，咬破了嘴唇，哭泣着，喊叫着，甚至歇斯底里大发作，但仍然继续练唱，我盼望着有个出头之日，盼望着成名成家。

1932年早春，我们剧院来到莫斯科，在大剧院举行演出。演出前我们获悉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要来观看。我们真是兴奋极了，夜以继日地排练，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我多么渴望能够在这家享有极高声誉的剧院舞台上演唱啊！同往常一样，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如愿以偿：索菲亚·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患了咽喉炎，只好改动节目单，把歌剧《艾达》换成《卡门》，并让我在其中演唱主要的独唱部分，我真是高兴极了，演出前我整整化装了3个小时。我激动得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双膝颤抖，满脸通红。盼望已久而又令人不安的第一遍铃声终于响了，接着是第二遍、第三遍。指挥走到谱架前。主要独唱演员应邀走向前台。观众和演员们的目光都投向政府首脑的包厢，里面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斯大林。他亲切地微笑着，站起来同大家一起鼓掌。欣喜若狂的欢呼声在大厅里回荡着。

吊灯缓缓地熄灭了，乐队奏起了序曲。

我的眼前闪现出自己短暂的一生……亏得指挥亚历山大·梅利克-帕沙耶夫帮我进入了角色……

大剧院的首场演出结束了，锦缎帷幕最后一次降了下来。大厅里喧嚣起来。

小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叶芙多基娅、奥莉加·克尼

佩尔·契诃娃、阿拉·塔拉索娃向我献了花篮和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韦罗奇卡，^①您唱得太动听了。莫斯科好久没有听到和看见如此令人消魂荡魄的《卡门》了。这些美丽的鲜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送给您的。”塔拉索娃亲吻着我，细声细气地对我说。

我非常幸福，眼睛里流出了激动而欢快的泪水。我被邀请到政府的包厢里来。当我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被介绍给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

“达维多娃同志，对待自己的成绩”，斯大林轻声地说，“应当不骄不傲，当心，别头脑发热！”

伏罗希洛夫赠送给我一盒巧克力糖，奥尔忠尼启则送给我一个小盒子里装有珍贵礼物的奇妙的小盒子。

“达维多娃同志，”斯大林停顿了一会儿又同我讲起话来，“您想住在莫斯科，在大剧院工作吗？”

我回答说，我要考虑一下。

“这样处理问题就对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三思而后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要请主管剧院的同志们作出有关您的工作调动的决定。列宁格勒人才济济，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就工作得很出色。”

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斯大林凝视着我，这是一种有权势的男人寻根问底、威严不可侵犯的目光。这一目光虽然稍纵即逝，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斯大林在窥探我内心的秘密，并谨慎地估量着，我是“同意”呢，还是“反对”？……

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了政府调我去大剧院工作的调令。

我在列宁格勒时就已经与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切德利泽·尤日内结了婚。从新婚初期，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长时间的争吵以后，我们达成了这样一

^① 薇拉的小名。——译者注

种协议：每个人都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但不得离婚和彼此遗弃。

1932年

3

大剧院经理处友好善意地接待了我。当时我太天真了，心想，凭着自己的声乐修养和表演技巧，理应受到尊重。但不管怎么样，我终究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我成为国家最高歌剧院的一名独唱演员，在这里登台演出的有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夏里亚宾、索比诺夫、涅日丹诺娃……

11月7日早晨，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十月革命大会。晚上演出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普斯科夫姑娘》。在政府首脑的包厢里，斯大林和身边的人边看演出边热烈地交谈着。8日晚上，按照惯例，克里姆林宫应该举办音乐会，我自然要参加演出。但晚上六点钟我接到这样的通知：音乐会取消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突然”死去。她曾经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过。

我如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很想知道领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聪明、美丽、富有风趣、有教养和精力充沛的人吗？她是否热爱艺术、音乐、绘画、文学和芭蕾舞呢？或者是一个平凡的养尊处优的党的贵妇人——女学究呢？

我们这些演员连对无足轻重的琐事都富有好奇心，交谈时常常彼此发问：为什么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和观看演出时都不带自己的夫人？我在首演《多余的谨小慎微》时，匆匆一瞥，发现斯大林在场。12月底他又来听歌剧《恶魔》。

除夕之夜我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音乐会，演唱了歌曲。音乐会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被邀请出席演出宴会，安排我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坐在一起。这两个胸前挂满勋章的人谈兴很浓，使我没有寂寞和不舒适的感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吃得很少，几乎没有喝酒，他以喜悦的目光看着我，我心里感到很平静，有说

不出的轻松和愉快。新年晚会就在这种气氛中于午夜结束。

要离开时，我突然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不知谁写的小纸条：“练马场附近有汽车等您，司机会把您送到该去的地方。请把纸条保存好。”

纸条上没有署名，我非常害怕。夜已经很深了，没有人可以商量，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冬季的暴风雪之夜，街上很冷，站在那里我不禁联想起近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在大剧院的包厢里，我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时，他是怎样看我的；为什么在这个新年晚宴上我恰恰和他坐在同一张餐桌进餐？我竭力排除那纠缠不清的想法：他难道真心爱上我了？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归根到底，上帝创造出来的漂亮女人，就是为了让男人们去爱的。世世代代的智者、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一直都是这样写的。

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有一个中年人，他走到我面前，仔细地看了看我，彬彬有礼地问候我，然后说道：“小汽车在等您，您坐到车里暖和暖和吧，现在街上冷得要命，恐怕有零下32度了。”

这个又高又瘦的陌生人把我领到汽车前，他打开了车门，帮我坐上车。马达很快发动起来，汽车全速行驶，基辅火车站的轮廓、多罗戈米洛夫斯克关卡的陈旧房屋依稀可见。我们驶到一处僻静的围墙前，司机通报了以后，从门卫室走出几个军人和文职人员。

“夫人，您有什么证件吗？”一个大汉问道，看样子他是领头的。

他那宽厚的男低音特别刺耳。我出示了证件，大门便自动打开了。眼前出现了一座非常雅致的房子，它酷似18世纪末的古老庄园。一个寡言少语的女人把我领进了舒适的客厅，我冻得满脸通红，顾不得脱下外衣就一下子坐到沙发上。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已经到了？”我听到斯大林那熟悉的、用非俄罗斯人的很重的喉音发出的问话。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刚到。”

“现在我叫人帮您脱衣服。”

一个女人帮我脱下了皮大衣，摘下了皮帽子和手套。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呆滞无光。

“您大概饿了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温柔地说，“咱们到餐厅去，那里想必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在我这里可不必拘谨哟！”

走在这松软的地毯上，真叫人愉快。在一张小餐桌上铺着雪白的绣花台布，上面摆着两套餐具：极精致的碗碟、旧式镀银的餐叉、餐刀和汤匙。

一个彬彬有礼，不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招待我们就餐。连大剧院的小卖部也没有这么精美的食品。看到这些美味佳肴我胃口顿开，兴致勃勃地品尝了香味浓郁的多年陈酒。我简直不敢相信，元月第一天我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黄瓜、四季萝卜、西红柿、梨和苹果等，我有些发呆。

“我们的食品储备不多，只给您准备了葡萄酒、鱼子酱、鱼、甜食、蔬菜和水果。”斯大林看到我诚惶诚恐的样子，低声说。

“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我该准备回家了，您大概也累了吧！”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需要认真地交谈一下，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那里没有人打扰我们。”

斯大林的心思很难猜测，他的语调非常可怕，我没有勇气问他。喝了浓烈的咖啡和味道极美的格罗格酒，我恢复了常态，不再感到恐惧和惊慌失措了。我跟在他后面。我发现，原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比我矮。我们走进一个放着低矮的大沙发床的套间，斯大林请求允许他脱去军上衣。他披上一件东方式的宽大罩衫，坐在我身边，问道：

“可以关灯吗？在黑暗中谈话更方便些，我很想坦诚地同您谈一谈。”

还未等我回答，他就关了灯。我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约瑟

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开始拥抱我，我默不作声，接着，他又开始灵巧地解开我丝绸内衣的扣子，我的心颤抖起来……

“斯大林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不要这样，我害怕，让我回家吧！”

他对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苦苦哀求根本不理睬，黑暗中只能见到他那野兽般的眼睛里燃起的熊熊欲火。我再一次试图从他那搂得紧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但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变得软弱无力。斯大林继续亲吻着我，抚摸着，他那又硬又扎人的胡须刺得我脸、下颚生疼……

早上我梳妆完毕，吃了点东西。斯大林把脸刮得铁青，身上洒了香水，走过来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觉得怎么样？”

我沉默不语。他要回小纸条，当场把它撕得粉碎。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分到房子了吗？”

“没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住在剧院的集体宿舍里，我打算在公共住宅里租个房间。”

斯大林笑了笑说：

“我希望您能守口如瓶，不要把我们如何共度除夕之夜这件事张扬出去。”

“当然，斯大林同志。”

“您可以叫我的名字和父称。”

分手时他那灰褐色的眼睛又闪烁出光芒……

严寒使我恢复了精力，使我的心平静下来。

司机把一箱子食品搬进我的房间，他被斯大林这沉甸甸的礼物压弯了腰。

“请您开诚布公地告诉我。”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我把一些故事情节写入记事本以后问道，“我讲的事情不会使您感到太尴尬吧？”

“万事开头难。然而，既然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走这一步，那么，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也要继续走下去，并且一定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

“您要万分小心。”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警告我说，“您的记录不要给任何人看，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请您把字打在卷烟纸上，不要打日期，并且只打一份，最好留一定的间隔。我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烦地叮嘱您，是因为我很清楚国家安全机关的威力，知道它们的厉害。您应该知道，我们都在冒险。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只好矢口否认，您也必须象我一样……”

1933年

4

我被叫到大剧院经理处，他们又把我介绍给莫斯科苏维埃一位领导同志。这个人要我一个星期以后去找他。一个星期以后，就在约定的那一天，我领到了三间一套单元的住宅居住证。不久，又有人给我运来了时髦的家具，并安装了电话。

我每走一步都感受到他的关怀，我明白他在找到“理想的新欢”以前是不会和我断绝来往的。这种前途对我合适吗？我常常扪心自问。斯大林已经54岁了，而我才只有28岁，年龄相差太大了。然而，我能拒绝他的追求吗？他是时局的主宰者，他可以随时随心所欲地在创作和肉体上宣判我的死刑。

一个月的时间快过去了，这期间他一次也没来过剧院。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刚走出剧院大门，司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就走到我的跟前。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接您来了。当然，如果您需要回一趟家的话，我可以先送您回去，并在那里等您一会儿。”

司机的殷勤使我很高兴。在家里我卸了装，换了衣服，我知道斯大林不喜欢袒胸露臂的连衣裙。为了他我还换了一双矮跟便鞋。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要我坐在车子后排的座位上。我发现车

窗上拉着深色的窗帘。

车又驶到了那熟悉的别墅，周围一片寂静，显得古朴、肃穆。

殷勤的男仆们帮我脱去外衣，他们的眼神暗淡无光。斯大林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跟前。

“达维多娃同志，我获悉您得到了一套三居室的舒适的住宅。”

“非常感谢您！房子的确好极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恳请您叫我的名字和父称吧！”

斯大林涨红了脸，嚷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要记住，不允许随便打断我的讲话，更不能教训、顶撞、命令我。我们应当清楚，应该怎样同别人讲话！”

他两眼冒着怒火，大发雷霆，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我后悔这样冒失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个小时，这位显赫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勋章获得者走进客厅，又甘愿满足一个女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你想吃饭吗？”他直接了当地问我。

“非常感谢，不用，我在剧院吃过晚饭了。如果能喝杯咖啡倒还不错。”

我们走进卧室，斯大林的床铺已经铺好。

“喂，你为什么坐着不动，呆若木鸡？这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难道可以这样同女人谈话吗？”

斯大林关上灯，然后声音嘶哑地叫我。随着他的呼唤，我和他都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

他拿来了洗好的橙子、梨、饮料、核桃、扁桃、葡萄酒和巧克力等食品，可我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没吃，只是伸直了脚休息。

“韦罗奇卡，您是客人，可不该让我这个主人，一个高加索人

难堪哪。”

我无意中发现床头柜上放着福雷耳教授写的《性的问题》一书。

“您拿去看吧，”斯大林无精打采地说，“这本书富有教益，送给您啦！”

我什么也没有问他，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自愿地讲出自己的隐私。

斯大林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斯大林正用手温柔地抚摩着我。

“在我们的道路上是不能止步的，也不该休息。”他说，“我们应该继续走下去。你长得太美了，这使我精神振奋，使我这个高加索人热血沸腾，我已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

清晨，他悄悄地起了床，没有同我告别就走了。我起来以后，女管家非常高兴而又亲热地对我说：“薇拉·亚历山德洛芙娜，您的到来真使我们高兴极了。我已给您准备好了早饭：沙拉子、煎牛排，我还煎了土豆，煮了可可。您趁热吃点儿吧！要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会生我们的气了，以为您不喜欢吃我们的饭菜。”

饭菜做得很可口，我吃得很香。

一位沉默寡言的老年妇女拿来了衣服，老太婆长着一双鼓起的黑眼睛、宽鼻子、薄嘴唇，紧咬着牙。她的长相实在不招人喜欢。

5

星期天，我计划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去，很久没有到那儿去了；可是我青年时代的同学，列宁格勒的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打电话约我同他一起度过休息日。我只好改变原计划。一整天我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的：白天，我们去了索科利尼基公园；傍晚我们在餐厅小坐，然后一起到我家去吃晚饭。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星期二晚6点在家门口等他。我感到他的话带有威胁性。那一天过得真倒霉，一切都不顺心，连电话也不愿意打，保姆同我说话，我也答非所问。

我在家等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即使是与斯大林交往，我也有权耍小性子。可是那一天……司机领着一个面孔阴森的陌生人来了。这个皮肤淡红褐色的不速之客伸出了长满汗毛的铲子似的大手，自我介绍说：

“我是图佩林·萨夫拉斯·伊万诺维奇。达维多娃同志，允许我看看您的住宅吗？”

我带他看了卧室和其他的房间，也让他看了厨房、浴室和洗脸间。他细心地看了我家的一切，并仔细地检查了电线，翻阅了书籍和乐谱，还长时间地在照片中翻来翻去。

我把饭桌摆好，请“客人们”在我家里就餐，开始他们藉口工作忙，婉言谢绝了，但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图佩林和瓦西里还是坐到了餐桌旁。他们高兴地喝了伏特加酒，吃了鲱鱼，煮好的热土豆和肉饼。饭后图佩林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由于您常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您！”

“防备什么？”我惊奇地问。

“防备国内外的敌人。莫斯科苏维埃已经决定，把和您住在同一单元的所有邻居都迁到别处去。”

原来我已经被“保护”起来，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正在瞪大眼睛监视着我。

图佩林好像是顺便问一句似的：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认识电影导演叶夫根尼·韦尼阿米诺维奇·切尔维尼亚科夫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和他先到索科利尼基公园，然后又到餐厅去找了吉卜赛人，很晚您才领他回到您的家，是这样吗？第二天清晨他回到‘萨沃伊’旅馆。”

我很生气，大声地斥责他：